

西泠印社占湖山之胜，掇金石之华，裙屐踟蹰，楼台掩映。回首良辰，俯仰陈迹，谁谓星移物换，光景常新哉。试忆曩时，叶君叶舟、丁君鹤庐、吴君潜泉，湖楼一榻，以研讨斯籀、抚刻印玺，为闲居消夏之乐。而王君福庵，时时从金沙港畔来会，优游洋矣，岁月清华。未几而印社成，印人聚，泉石增基藻绘，花草咸有精神。然苟非二三君子，有希古通方之雅，益以经营策画之劳，则江山虽美，未必即为人文之助也。

——《西泠印社志稿孙智敏序》

西泠印社

XILI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ARTS

篆刻文献学研究 小林斗盦纪念专辑

总第二十五辑



西泠印社 编
上海出版社

○ 主 编 导 语 | CONTENTS

陈振濂

本辑《西泠印社》我们精心组织了一个“篆刻文献学”的学术专题。在篆刻艺术从学科上来说还远未取得应有地位之际，呼吁对“篆刻文献学”给予高度关注，是极有必要的，因为它是篆刻学科确立的根基与前提条件。由四位中青年作者倾力撰写的关于文献学研究的论文，告诉我们这门学科所可能会拥有的基本框架、内容分布和目前所遇到的难题。我个人以为，这是十分必要的一次“启程”，但还远远不能说是“毕其功于一役”，只能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后面的路还长，正未有穷期。

已故名誉副社长、日本小林斗盦先生的遗作展与藏品展，2009年11月在西泠印社举行隆重的展出。小林斗盦先生的亲属与门生们都专程赴杭，借助于这次机会，我们有幸接触到了这位以毕生献给篆刻艺术的可尊敬的老人的方方面面。在与展览主办方充分沟通之后，我们发表一批珍贵的小林斗盦先生的相关作品与藏品史料，并以此一瓣心香，献给已故的小林斗盦先生，纪念他对中国篆刻、日本篆刻和对西泠印社的巍巍功业。

来楚生前辈是西泠印社中期的社员，他的书法、国画、篆刻均有极鲜明的创造特色。2009年正值来楚生先生诞辰105周年，社内同仁精心组织了来先生的书画篆刻展。对于这样一位开宗立派、堪称艺术大师的谦和的老前辈，限于条件，西泠印社能为他老人家做的事还是太少太少。在今后，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弥补这些遗憾。

本辑还有一些社员个人的活动信息，牵涉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方面。希望在今后，有更多的来自各方面的社员信息能在《西泠印社》上发表。像西泠印社这样一个百年名社，正是通过每个社员的努力，百川归海、万法归宗，才有今天这样的兴旺景象。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每个人在专业上所付出的努力，其实都可以被看作是在“写历史”，写西泠印社之大历史。从吴昌硕到沙孟海到启功，一代接着一代，薪火相传，才会有这百年、甚至千年万年的历史。每一个社员都应该以此信念来激励自己。

2010年3月15日于杭州孤山之麓

西泠印社

●| 2010·1 总第二十五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泠印社. 篆刻文献学研究、小林斗盦纪念专辑 / 西泠印社编. —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03-1180-5

I. ①西… II. ①西… III. ①篆刻—文献学—文集 ②小林斗盦(1916~2007)—纪念文集
IV. ①J292.41-53 ②K833.135.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5410号

《西泠印社》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詹 功

副 主 任 郭仲选 刘 江 朱关田

程十发 韩天衡 陈振濂

魏皓奔 童衍方 李刚田

马五一 王铁全

编 委 包正彦 黄镇中 金鉴才

余 正 熊伯齐 孙慰祖

祝遂之 孙其峰 杨鲁安

张建平

主 编 陈振濂

副 主 编 包正彦 赵一文 黄镇中

江 吟

编 辑 (姓氏笔画为序)

王佩智 邓 京 叶 莹

吕金柱 朱妙根 吴 莹

邱 云 余 成 张钰霖

林鹏程 顾祥森 郭超英

桑建华

责任编辑 崔 伟

执行编辑 郭超英 叶 莹

封面篆刻 张炜羽

出 版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邮 编 100735

编 者 西泠印社

地 址 杭州市延安路484号

市府综合楼3号楼5楼

邮 编 310006

电 话 0571-85812993

传 真 0571-85812974

网 址 www.xlys1904.com

电子信箱 xlys_1904@163.com

xlysshekan@sina.com

设计制作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6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

书 号 ISBN 978-7-5003-1180-5

定 价 28.00元

●| 目 录 | ■ CONTENTS —|

主 编 导 语

篆刻文献学研究

关于印学文献学的一些思考 ————— 孙向群 04

试论“篆刻文献学”之构建 ————— 徐 清 14

论篆刻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 郑利权 20

明清篆刻学文献考辨刍议 ————— 朱 琪 24

社藏印谱

西泠印社藏印谱文献选 ————— 35

小林斗盦纪念

《怀玉印室藏印选》集序 ————— 38

小林斗盦先生简历 ————— 40

小林斗盦篆刻书画选 ————— 42

怀玉印室藏印选 ————— 49

西泠掇英

来楚生诞辰105周年书画篆刻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 56

读三十年来楚生先生两封信的新感悟 ————— 瞿志豪 57

来楚生篆刻书画选 ————— 59

艺林叙旧

春夏秋冬一百年 真草隶篆三亿字

——著名学者胡士莹书法艺术漫评兼及其他 ————— 杨宇全 65

祝世禄留下的篆刻作品 ————— 许 潆 68

佳作欣赏

中国近代篆刻名家精品选

——选自日本篆刻家协会编《日中名家刻印选》 ————— 69

刀石声里说湖州

——我和《印说湖州》 范 斌 81

社员成果介绍

在印学的深处寻觅

——我读孙家潭新著《大风堂古印举》 王佩智 83

史料征存

西泠印社重大活动史料征存（四） 诸葛慧 84

印社信息

翰墨华章 精彩纷呈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书法学术邀请展系列活动圆满结束 85

张寒月金石篆刻艺术展开幕 张寒月金石篆刻研究会同时成立 86

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序（一） 李学勤 87

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序（二） 沈 鹏 87

“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报道集锦 88

王冬龄巨幅草书《老子》捐赠浙江美术馆 94

“游刃金石·费名瑶篆刻艺术展”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 96

袁道厚率13女弟子献艺中国印学博物馆 96

关于印学文献学的一些思考

□孙向群

一、关于文献学

传统解释：“文”是指典籍；“献”指贤人、贤才（其实是指这些人所创造出的文化知识，和他们所掌握的文化知识，而这些基本上最终都是通过典籍等各种载体而体现出来的。故此，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看，“贤人”和“典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献”当是指：记录知识的载体，并非完全指典籍，但是偏重于典籍，而我们所做的文献工作，就是为我们的学习研究而组织、准备必须的知识，是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方法。而文献学是研究如何为促进学术研究而科学组织、获取知识的学问。

搜集、发掘到的文献只是原料，必须加以鉴别和整理，文献学最主要功能就是关于史料如何鉴别和整理的学问。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有很多人认为，文献学只是由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三者构成的，但是，随着文献学的自身发展和进化，现在看来这三项并不是文献学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洪湛侯先生在《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1]中认为，把文献学的内容限于目录、版本、校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这三个方面都是文献整理的方法。而完整的文献学的内容，应包括“体、法、史、论”四个部分。体，是指文献的载体；法，指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典藏等整理文献的方法；史，即文献学自身历史；论，即文献学理论。笔者认为这是目前对文献学较为系统而科学的总结。

二、关于印学文献学

随着各类学科研究自身的逐步深入完善，各自对文

献学的要求就各具特性，很多问题不是大而统的文献学所能解决的。为专业而设立的文献学便应运而生。我们要建立的印学文献学是：研究如何根据印学研究、印学史料的特殊性结合文献学基本知识对印学文献进行系统的、科学的鉴别和整理的学问。

所谓的“印学研究特性”就是，印学包含社会性和艺术性两个大部分，印学文献中的实物文献具有非常强的艺术性，所以，研究印学史必须是历史的、艺术的。印学史料由于社会受众面窄、受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而存在系统不完备、所需的知识范围广、文献在种类和体例方面构成复杂、在流传中很容易亡佚等状况。由此造成印学文献在具有文献普通意义的同时也具有普通文献学无法解决的特殊性。例如：作为印学专业文献在构成上，就必须比洪湛侯先生分类要多出“类”这一项，所谓的“类”就是指研究印学所需学科的种类。如我们在研究秦汉印时，必须涉及到冶金铸造、考古、文字、官职、地理等等不同学科的知识。

印学文献还在类别、载体、研究方法、历史、理论方面各具特性，如：在文献载体方面的印章实体和印谱的成谱与流传等；在研究方法上的印章实体的鉴别评价、印谱版本的考证等。印学文献研究自身的发展经历与其他专业的规律不同；历代对印学文献整理认识的理论和其他专业文献整理也有不同。建立印学文献学，是为了及时对前人的印学成就进行总结，结合本学科特点，全面而系统地形成研究规范，指导对于浩瀚历史文献和现代正在产生的文献的科学分类、整理。

三、关于印学文献的类别

“类”就是种类。如何架构和区分印学文献的类别，主要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印学研究指导思想，如果只是为了创作而了解历代风格，所涉及的也只不过是历代印迹和创作理论等小范围。但把篆刻艺术放回到历史发展的链接中，去整体而系统地观察其发展规律时，你就会发现，篆刻艺术只是印学的一个部分。印章不论从其产生、形制与形式的定型和变化、印材选择标准、内

容和文字风格变化等方面，都记录着历史变迁而带来的社会体制、民俗文化、冶炼技术、矿产资源等方面的变化；记录着历代学术思潮、哲学思想、美学观念等审美意识的更替，成为历史、文化、知识、艺术的载体。因此，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印学研究，学术地看待印学研究，艺术地看待印学研究。

文献工作如何组织知识？这对我们的研究影响重大。知识准备的方法不科学，研究就有存在不正确的可能；准备的知识不完整，我们的研究就会“发育不良”而存在缺陷；准备的知识不充分，研究成果就可能显得单薄而没有深度。因此，印学文献除本体之外，还应该包括历史、社会、哲学、美学、考古、文学、文字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和与印学发展有关联的文献。

总之，文献类别的划定，是我们把篆刻艺术融入大历史、大文化、大学术中去的关键一步，从而进一步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揭示其自身价值和发展规律。

四、关于印学文献的形态

关于印学文献，与其说是载体，不如说是文献存在的形态更为准确。如在材质上有甲骨、青铜、石材、竹木、陶瓷、绢帛、纸张等；在制作方面有刻、铸、写、画、印刷、现代科技手段的声像录制等；在出版形式方面有图书、报刊、光盘、磁带等等。因此，建立印学文献学必须关注印学文献在载体、材质、制作、形式等方面的特性，以便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剖析。

除却和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联系，印学文献在材质上主要分为实物文献和纸质文献两大类。实物文献是指印章本体，纸质的是指印谱、著述等等。但印学文献有一部分在制作、形式方面和其他文献有所区别，例如，印谱在印章收集、出版形制、制作手段、传播方式等方面就和一般书籍不一样。再则，历代印迹也不都是只有在印谱中才出现，如战国墓出土的绢帛上留存的印迹，历代书画和典籍上留存的文人、书画家、收藏家的用印，历代文书上保存的官印（如吐鲁番和敦煌文献中留存的唐代印迹），一些石刻文献中也摹刻了许多印章，

大量印论以各种形式散落在各种典籍之中等等。所以我们在收集整理印学文献时必须开拓自己的视野，不要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总之，我们应当科学而系统地了解 and 熟悉文献不同的形态特征，在收藏、分类著录、管理方法、研究手段方面及时地总结出相应的经验。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也要关注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声像文献、电子文献的收集整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类文献将越来越多，并且很多历史文献的保存和传播方式也将逐渐向影像化、电子化转移。例如：四库类丛书的电子版的出现，大量文献史料的阅读方式的转变等等。因此，在方便利用的原则下也要探索出保存、流传等方面的新方法。

五、文献的研究方法

对文献的研究方法的总结，我认为洪湛侯先生的总结比较有创新意识：

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都是文献整理的重要方法，再辅以标点、注释、翻译、资料搜集、文献保藏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就构成了文献学方法论的完整内容。

关于“辨伪”、“辑佚”两项，有的文献学家将其编为“目录学”中的子目，而洪先生则将其独立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并列，这是合理的。但把现代“标点”、“注释”、“翻译”的整理文献手段提升为文献研究方法，我认为这些似是编撰手段，归属在“编纂”的范畴内较为妥当。另外，程千帆、徐有富先生在编写《校雠广义》时，把文献的收集与收藏也作为文献研究的方法，单列出一本《典藏篇》，对藏书的历史，藏书的收集、鉴别、管理、流通等几个方面的知识进行介绍，并将其上升到了“典藏学”的高度。

我认为将梁启超的“史家四长”和历史学的“史料分类”、“史料考证”引为方法，是对原有文献学研究方法的补充，特别是“史家四长”当为诸方法之首要。研究方法不能被前人定义所限制，必须根据印学文献的

特性，通过我们的实践，在前人的基础上去丰富完善，绝不能机械地照搬硬套。

任何方法作为使用工具都是为人所用的，主要是使用者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运用这些方法。由于篆刻艺术在文化性和技术性方面和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为特殊，仅必须通篆这一点就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社会中参与篆刻艺术的人终究是少数，印学研究不可能成为显学。而从事印学研究的绝大部分都是从篆刻创作转型而来，很多人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思维方式依旧还是停留在艺术创作层面上，对历史研究学科的规律了解甚少。而印学史虽然有一部分是艺术史，甚至很多内容都需要用艺术眼光去进行审视，但历史研究和艺术研究在思维基础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所以印学研究存在着“通历史研究者不通篆刻，通篆刻却不通历史研究”的现象，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导致印学研究的自我封闭，很难结合吸纳其他学科的精华，这是制约印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印学史终究是历史研究，艺术思维只能是其中的研究方法之一，而研究印学史的方法的灵魂，当是历史研究的思维方式。

1. 史家四长对印学文献整理的重要性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曰：“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史才专讲史家的文章技巧。”

他认为“史德”就是忠实。如鉴空衡平，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要求研究者铲除诈伪、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特别是“史识”，梁氏认为观察的程序可以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而且要“伺两种方法应当并用”。他强调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就必须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在历史方面我们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评，最易为前人记载或言论所束缚。再则，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这些观点不但是史学家应该做到的，在印学文献整

理过程中也必须要遵守，因为整理文献的最终目的就是

2. 印学文献整理中如何运用目录学

顾湘《篆学琐著》中除了版本问题，还存在分类不清的问题，他没有把“著”、“述”、“纂”区别开，也没有将专著、序跋分开，由于没有按照目录分类的原则进行必要的分类，所以比较混乱，给分类比较带来了麻烦。

程千帆、徐有富先生在《校讎广义·目录篇》中认为目录学：“它着重研究如何编制和利用各种目录。”

姚名达先生则是从读书治学的角度给目录学下定义：

“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目录包括单本书目录和众多书的书目两部分。

普通文献学中的目录学是针对大文献的范畴所设置的，运用到印学文献整理中，则必须根据印学文献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正如程、徐二位先生所说：“目录的编制还受到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的制约。”最典型的就是印学文献的目录分类问题，由于在种类、体例和数量等方面没有那么完备，因此我们无法按照现有的文献目录方法对其进行分类。但是，具体的分类原则是可以借鉴的，如洪湛侯先生的总结：

(1)依据学术性质；(2)同类书籍约略依时代先后为次；(3)书少不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近之类；(4)学术性质相同者再依思想的派别或体裁的歧异分类；(5)一书可入二类者，互见于二类；(6)一书中有一篇可入他类者得裁篇别出；(7)摘抄叙录纲要；(8)但列书目而无篇目。

印学文献学的整理，可以按照内容和体裁等方面因素进行目录分类。例如：在大的方面，可以分为本体类和辅助类；按照功能，可以分为历史类、理论类、创作类；按照载体可以分为实物类和典籍类；对实物类可以分为秦汉印和篆刻作品类；对典籍类的文献，按内容可分为著作类、编述类、抄纂类；在体裁上，可分为专著类、序跋类、诗歌类、语录类、谱录类等等。具体如何分类是合理的？是否能够达到目录学的要求？还有对实

物文献如何分类编目？印学界尚没有明确标准，这就要靠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探寻。

除解决分类问题外，我们在编制目录时，还要注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已经亡佚的文献。虽然现在已经无法见到这些文献，但这些文献的存在，曾经对历史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笔者在文人别集中的序跋、诗词、书信、墓志铭等中发现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印谱、印人等史料，如：在宋、元两代的发现就改变了我们对印学史的旧有看法。^[2]因此对这些亡佚的文献的查考、价值的辨别、目录的建立，非常有必要。有兴趣的可以将此做一个专题，写一部《印学史中亡佚文献的研究》。

另外，目录学中编纂索引辞典的工作也是我们印学研究者应该关注的。总之，如何根据印学文献的特征和自身研究规律建立适合印学研究的专用目录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新课题。

3. 版本学在印学研究中的运用

版本的区分鉴定对印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一些书中存在错误，所以书有时候也会和你开玩笑，特别一些现代编辑排印的大型文献书籍。

我在读《全元文》第47册中沈右《唐释怀素草书清净经》的跋文时，发现错得让人啼笑皆非。造成错误的是《全元文》编辑者和清代《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编者。首先，《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所记载的《食鱼帖》当是一件伪作，这段跋是造假者依据真怀素《食鱼帖》后的赵孟頫跋文（此跋后被拆裱入怀素《论书帖》后）篡改而成的。沈右生于元末，不可能生活在“延祐五年十月廿三日”！《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的编者不加考辨，照抄直录。《全元文》编辑者则错上加错，将文彭跋《清净经》跋文的前半段和假《食鱼帖》假沈右跋的后半段混成一体，闹出了张冠李戴、让元代人在延祐五年（1318）却能评说一二百年以后的明代文家鉴藏之事的笑话。

如果认为《全元文》是“国家‘十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教委人文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十五’重点项目”等等而一味地相信，不

去深究，那将是十分可怕的。这就提醒那些读书不注意版本的人，学术研究不能图方便。而且提醒文献整理人员要仔细，且严格按照版本学原理进行选本校勘。

版本学由版本分类、版本鉴定两大内容组成。由于印学文献很多鉴定方法和普通文献版本鉴定的方法基本相同，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而印谱的版本问题比较特殊，关于印谱版本的鉴定，韩天衡先生、陈振濂先生对此都有专文论述。笔者在《明代印谱、印论、印人活动的研究》一文中对明代印谱在出版、序跋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并已经完成了《印谱的版本鉴定》一书的初稿。

版本鉴定的基础是版本比较，而版本比较的基础是版本分类的基础知识。如按时代分类的有唐本、宋本、辽金元本、明本、清本；按地区分类的有蜀本、建本、平水本等；按刻书单位分类的有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按形式分类的有巾箱本、写刻本、朱墨本、蓝印本、套印本等；按刻印情况分类的有祖本、递修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节本等；还有稿本、抄本。我们不能小看这些名词概念的界定，只有熟练掌握这些名词的概念，才能胜任版本辨别和鉴定。例如我对顾从德《集古印谱》原拓本、罗王常《秦汉印统》版本的追溯就是建立在对这些名词概念运用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些名称是否可以完全直接套用到印学文献中？

我在读国家图书馆藏郭胤伯《印史》时，根据谱中王朝麟的序，基本认定此谱是《松谈阁印史》的一种版本，国图记此谱为“明抄铃印本”。我对这个命名感到非常疑惑，“抄铃印”是什么概念？既是抄本那么就不可能是原谱，而且印谱怎么会有抄本？且此谱所集印章是用秦汉印直接拓集的，绝不是翻刻。仔细观察发现，除板边框是刻印的外，其余板框线都是手工绘制，文字也都是按照刻板文字特征钩写的，据此我认为可能是《印史》刻板印刷前的稿本。但是我请教王涵老师，她说这不符合稿本的定义，因为稿本是针对作者修改的原本而定，此谱没有任何改动，应该是抄本，因为抄本包含刻板前的誉清抄本。但我觉得应该用一个新名词把这种抄本和其他一般意义上的抄本区别开来，为此取了一

个名词“誊清稿样本”。

西泠印社所藏此谱竟然也是同样的情况，所有文字都是抄录的，除都有王朝麟的序外，郭氏自序也不一样（国图本为《郭胤伯印制考》），收印条目顺序和所收印章数目也多有不同。最为不一样的是抄写方式有很大的区别，西泠印社本没有板框和版线。

赵叔孺在跋中曰：

明武平郭宗昌《松谈阁印史》流传极鲜，曩见于上虞罗叔言参事许，叔言甚珍秘。而是谱则为郭氏手定稿本，较之罗本尤可贵。

王福庵跋曰：

惜此书传世者鲜，得之弥足珍贵，况此稿本，尤为可宝。

此书传世极少，目前我只见到这两本，有没有刻本行世我不知道。结合两本印谱的情况，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存在：一、《松谈阁印谱》根本就没有刻钤本，郭氏当年就是以抄、钤的方式成谱传播的；二、这两本是该谱在编辑过程中不同时期的“誊清稿样本”。由于没有看到“刻钤本”，所以目前还不能最后下定论。印谱版本情况特别复杂，很多情况不是现有命名所能完全涵盖的，如怎样区别附有边款拓片的印谱？如何区别没有印框和释文的印谱？摹刻印谱和一些假印谱应该怎样概念化准确表达？因此必须要根据版本特性进行新的版本类别命名。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文献史料的编辑都没有经过版本选择，例如顾湘《篆学琐著》中的版本选择就存在很大问题。笔者曾就周亮工《印人传》的版本问题进行过追踪查考，找出了由于乾隆年间编辑四库而抽毁的祖本——康熙十二年的《赖古堂别集印人传》。对徐官《古今印史》的祖本，朱简《印经》、《印章要论》的祖本等也进行过追踪。^[3]

4. 校勘在印学文献整理中的运用

历代各式样的《校书图》和校书陶俑都说明，校书一事当是古代文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项文化活动。“校勘的目的是改正书面材料上的错误，而校勘学则是研究和总结校勘规律的一门科学。”^[4]那么印学文献的校勘学应该是研究总结印学文献的校勘规律的。书籍在人

为的抄录、刊刻、印刷等方面都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讹、脱、衍、倒等现象，校勘学不但要校正错误，还要分析出错误产生的具体原因。除解决文字方面的错，还要更进一步在内容方面校勘出观念的错误。

在文献整理的方法中，校勘是最难以掌握的，因为它涉及各种类别的知识太多，如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和版本、目录等方面的知识，还应懂得地理、历算知识、古代名物、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而典章制度又包括职官、避讳、谥法等。特别是对内容观点有错误的文献的校勘，不只是对这些知识有简单肤浅的了解就够用的，所以校勘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和知识积累的工作，而且必须要平心静气、一丝不苟，不能有半点马虎。可以说当今印学界能胜任校勘工作的人不多，像笔者这样也最多只是简单的对校而已。如何在印学文献的研究中运用理校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校勘的方法分为对校和理校两种，对校又分为本校、他校。对校的方法相比于理校要简单得多，笔者曾就顾湘《篆学琐著》进行了一些选本对校，发现顾湘和其他古人在传抄中出现的各种错误。^[5]“琐著”本朱简《印经》中有：

张怀瓘云：“古人篆籀，都无节角，盖欲方而有矩，员不失规，如人露筋骨乃病也。”

读过似乎没什么大的毛病，但在我找到的《印经》其他本子中则是：

张怀瓘云：“古人篆籀，都无节角，盖欲方而有规，圆不失矩，如人露筋骨乃病也。”

这句话出于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原文为：

古文、篆、籀，书之祖也，都无角节，将古合道，理亦可明。盖欲方而有规，圆不失矩，亦犹人之指腕，促则如指之拳，賒则如腕之屈，理须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岂曰壮哉！

朱简没有据实全引，但大致意思是一致的。从字面上讲，“琐著”本的“欲方而有矩，员不失规”没有什么大错，矩为方之极、规为圆之极。但是为什么在朱简原文和张怀瓘的原文中都是“欲方而有规，圆不失矩”？到底是朱简抄错？还是《评书药石论》的底本出

错？还是顾湘编辑时改错了？认真读完《评书药石论》后确定，应该是顾湘改错了，张怀瓘的原义为“行圆意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在审美方面的反映，并不是方要方到极致，圆要圆到极致的意思。所以校勘不能是单一方法使用，应该是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综合起来运用。

校勘的原则也可以针对实物文献的勘察？如印谱由于印泥的干湿，纸张、绢帛粗细等原因造成的同一方印章铃盖出的效果不一样；一个篆刻家一生中多次刻制同一内容的印章；印面、边跋严重损坏的印章等问题的解决。

在印章实物方面孙慰祖先生对马王堆出土封泥的复原，可以说就是一次对实物文献实施理校的典型范例。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枚“残缺不全”的封泥，文字上半主要结构部分残失。孙先生根据以往残损封泥复原的体会，从残存文字的结构、笔画，搜索出相应的部首，用排除法筛选出残存结构特征所限定的对象。对缺损部首写法作出延伸、拼对，最后完成复原。科学的逻辑推理使复原后的印文在笔形、结构组合上具有唯一性。然后再根据封泥线条风格，分析出这是一方玉印所铃盖，结合其他同期出土文物的佐证，为此墓主人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半枚封泥的残损就如同典籍文献的文字脱漏，科学推理还原其原本，说明文物的修复也是可以作为文献校勘方法运用的。这就需要将理校原则与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创造和及时总结出适合印学文献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论。

5. 辨伪、辑佚、编纂、典藏在印学文献研究中的作用

印学文献辨伪要注意实物和典籍的不同，总结出考辨印学文献真伪的规律，是重要工作之一。所谓的辨伪当是指：考订古籍名称、作者、年代的真伪，也包括考辨内容、史实、学说的真伪。典籍的辨伪完全可以借鉴现有的辨伪理论，因为造伪基本上是“托古传书、造伪补佚、弋名牟利、相攻争胜、好事妄为”，因此辨伪在方法上都是“查明传授源流、考核历史事实、考订作者生平、分析作品内容”。

辨伪最重要的环节是“疑古”，疑古则是平时知识积累而产生出经验的体现，如果没有“疑古”，考证、辨

伪就无从谈起了。如对何震《续学古编》真伪的考订，我有文根据沈延铨刻本的版本、体例特征，推论其底本应该是一本没有完成的稿本，认为：“在没有可信的证据的前提下匆忙下结论是不科学的，所以笔者认为关于《续学古编》作者是谁的问题，还是应该暂从前说为好。”^[6]

对文献的辨伪必须要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不可以偏概全或凭文辞判定真伪。再则不能片面地认为所有伪书都是没有用的废书，因为就是伪书本身也是历史事实，搞清楚为什么伪、怎么伪、是谁伪等问题后，也能对历史研究起到帮助的作用，所以伪书不可一概废弃。

另外，我们在对实物文献的辨伪方面也要结合文物鉴定的方法和篆刻创作的方法进行必要的经验总结，以便形成专门的实物鉴定的方法。

再则，在典籍类里还有比较特殊的种类，如对于印谱、历代书画作品及藏书中的历代印章的辨伪，笔者在给南艺人文学院代篆刻课时，根据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的需要，结合我在跟随徐邦达先生学习古字画鉴定时对历代印迹的认识，撰写了《历代书画中印章的鉴定》一文。印谱的辨伪也有其特殊性存在，我们要区别对待仿刻和造假，如明代很多集古印谱就是仿刻的，仿刻也是集古印的一种方式，我们就不能称其为造假。还有一种印是假的，但不能说其谱就是假的，如葛昌楹编辑的《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印谱，谱确实是葛氏所集，但印却是汤安所假，有人说为仿刻，我不赞成，汤安之目的不是集古，而是射利，再则有的印章当是汤安空穴来风之作。还有被后人篡改，如南图藏一部印谱当是叶品三所摹，摹得确实精彩，后人将版心中标示涂去，当真谱传世。还有伪造“西泠八家”作品的印谱多种，有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假印假谱。这类印谱的辨伪方法，主要是对印章风格特征进行细致对比，对边款内容进行考证，以及用版本学手段等。

“辑佚”就是说一种著述亡佚后，人们可以根据其流传年代中曾经记载和转录、摘录或选辑过其内容的其他书中见到的部分遗篇，抄录后再按一定的方法、原则进行加工汇集的方法。具体方法为：辑录佚文、选择底本、注明异同、校正文字、恢复篇第。应该从类书、古

注、子史群书、总集、杂纂杂抄、地方志、金石石室秘藏与出土佚书、海外流散佚书等等方面入手，广泛网罗佚文，认真删汰繁芜，进行精密考订，作出合理编排，最后对所辑佚的本子要检查辑录是否完备，佚文是否可靠，考订是否精审，出处是否注明，体例是否完善。

印学文献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受重视程度不够，所以亡佚现象十分严重。笔者在平时读书和读谱时，也做过一些初步的辑佚工作，例如在读所谓《杨氏集古印谱》的几篇序中发现，失传的《杨氏集古印谱》的编者不是杨遵一个人，杨遵只是这部印谱的增补者，该谱整体的体例和主要部分的真正编辑者是元代陆友仁。在读明代沈润卿在明正德六年刻《欣赏编·十卷》初刻善本中的《集古印谱》时，发现此谱其实是由亡佚的宋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元代《吴孟思印谱》加上沈津自己收集的印谱汇集而成的。我还在《汉晋印章图谱》部分中查考出近二十多部宋代集古印谱的名称和编辑人。故此，搞清了史传《沈润卿刻谱》的基本情况，还寻找到这几部散失印谱。在读顾从德汇刻《集古印谱》时，发现其中有部分为亡佚的赵孟頫《印史》、吾衍的《学古篇》的《印式》等印谱中汇集出的印章和考释文字。

目前我们尚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按照辑佚的要求进行科学整理，甚至连究竟亡佚了多少有价值的印学文献的目录都没有整理过，更不用说是在浩瀚的文献中寻找收集某一本印学文献的遗篇断简了，所以目前印学文献的辑佚工作应该要借用辑佚的现有方法从基础入手。

实物文献中也存在需要辑佚的问题，例如，散落在各种印谱中的某一位篆刻家的印章的收集，根据风格特征对一些没有落款的印章作品作者的认定等等，这方面的知识也需要我们进行及时总结和创新。

关于汇纂，就是资料汇集。有丛书、类书，也有资料汇编性质的；有原文景印的，也有重新排版的。资料汇编是根据某一学科或某一个专题研究的需要，把散见的各种文献中的相关资料集中起来，按照一定规律分编，如：依时间为序，或依据作家、作品为序，按审美观点为序，按史料分类为序等等，做到有序而醒目。其原则是：不论是全部或者节选都必须提供文献资料的原

文，不可作任何改动。并且根据现代人的阅读需要，对原文要进行必要的标点和注疏，并标明校改文字，如不同的版本有异文，则另列校记。

汇纂资料大致可以分为：学科史资料汇编、人物研究资料汇编、专书研究资料、流派研究资料汇编、专题史资料汇编、特种文献资料汇编。在这方面，目前已经有很多的成果，如韩天衡先生的《历代印学论文选》、林乾良先生的《西泠八家史料汇编》、郁重今先生的《历代印谱序跋汇编》等等。在印谱方面的汇集就更多了，但是仍旧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汇纂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汇纂者在版本选择、校勘、标点断句、释读、注疏、最后校对等能力方面。如果说用原文景印的方法，编纂者只要在收集版本问题上下功夫，只要做到版本早晚、善劣等方面不出现问题就可以了。而用现代排印方式汇纂文献，就是非常见功力的事情。吴小如说：“标点一千字决不比写一篇千字文省时省力”；“能写一千字文章的人还未必能标点一千字的古书。”^[7]正确的标点，可以帮助读者的理解。反之，则造成对读者的误导。标点工作要求标点者应该具有必要的古汉语知识、古代文化知识、历史地理知识、词曲格律知识，还要准确判断其中的书名、篇名、人名、地名、朝代名、民族名；同时要求标点者工作必须要勤于查考、细心规范。具体规范，我们可以参考1983年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的《古籍点校通例》（初稿），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等。

在释读文字方面，误读对研究者带来的误导将更大，造成释读错误的原因最主要是由于释读者对篆法、草法、行法、异体字等不了解，更有甚者则望文生义，这种错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多少都会存在。

再则，汇编工作要求非常细心，特别是在读原文和转抄原文时必须细致。我在看一些汇集的年谱时，发现有让谱主和其一位朋友的结识时间，竟然是在这位朋友出生前的八年！细查这种笑话的主要原因是汇编者对原文不加以解读和考辨。

关于典藏方面的知识目前最有发言权的当是那些有

收藏的同道们，因为他们是直接来自于实践中的，要我们这些没有收藏的人来谈收藏终是有隔靴搔痒之嫌。典藏主要是如何收集、鉴别、保存、流传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敢越俎代庖了。

6. 印学文献的史学分类和考证

“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这是历史学颠扑不破的道理，而文献整理就是史料整理。一千多年前的史学家刘知几已经将所有历史著作分为两类：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于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19世纪末，西方史学方法论鼻祖伯恩海姆（1854—1937），将所有的史料分为传说与遗迹两类。这里的“传说”应该是刘知几“当时之简”、“后来之笔”的综合，所以伯恩海姆要比其多出了“遗迹”一项，而所谓的“遗迹”其实就是实物文献。西方近代史学家更喜将所有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直接史料可分为三大类：一、当事人直接的记载与遗物；二、当事人事后的追记；三、同时人的记载。凡非直接的史料，非原形的史料，经过转手的史料，都是间接史料。

西方史学对史料的考证分为“外部考证”和“内部考证”。所谓外部考证就是：从外表衡量史料，以决定其真伪及其产生的时间、空间等问题。其手法和版本、校勘、目录相类似。所谓内部考证就是：考证史料的内容，考证内容是否与客观的事实相符合或符合的程度。主要从记载人信用的确定、记载人能力的确定、记载真实程度的确定三个方面，对史料文献记载的确切程度进行考辨。内部考证法是我们应该吸取的。对真实程度的考辨方法，中西方的史学家都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

1. 即不是抄袭或毫不相干的两种记载，所记某事相同，则某事可信。
2. 如日蚀、干支纪年、民族习惯（如避讳）可资佐证的记载，则确实可信。
3.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记载互相歧异，较早的记载可信。
4. 文献记载得到实物的印证者可信。

我们在印学文献整理之初，就注重对史料文献进行史学性质和真实程度的辨别，对我们在整理文献过程中研究思路的形成、和今后的研究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7. 印学文献研究方法的拓展

学科是否有生命力，在于这个学科是否有创新的空间和能力。随着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文献种类的不断出现，研究文献方法也将要随之不断地更新和拓展。建立印学文献学的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行为，其目的就是自觉地对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进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所以笔者认为对旧有方法必须借鉴，但忌生搬硬套，还要及时结合文献自身的特殊规律，融入新的学科知识进行方法创新。例如，将文物鉴定的方法结合起来对实物文献进行鉴别；结合哲学思想、艺术审美观念的变化和个性化的不同对文献进行理校和真伪辨别；结合艺术创作技法的个性风格特征化，对没署名的篆刻作品进行归属性鉴定；结合书画鉴定方法和历代印章风格对历代书画、古籍上的印章进行真伪区分和时代确定；根据印谱在辑集、编辑、出版、流传等方面的特性总结出适合印谱研究的印谱版本学；如何解决印学文献自身数量小、分布广、文体杂、专业性强、收集较为困难的问题，制定文献汇纂工作规范等。

方法创新必须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思想观念、文化修养的不断提升、专业知识的不断更新扩容的基础上，要想对印学文献自身发展规律有准确认识和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及时归纳和总结，没有实践作为基础，一切都是空谈。

六、印学文献研究的历史和理论的建立和完善

学科是否成立或成熟，与其学科理论有着紧密联系。从事任何专门学科研究，必须弄清研究对象是什么？学科价值何在？研究方法如何？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如何等。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说该学科是成熟的。

学科没有经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其缺乏实践检验的过程，正确性和可靠性就值得怀疑。只有在印学文献鉴别和整理有了相当成绩和发展之后，印学文献学才可能诞生。

过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印学文献学这一概念，但我国对印学文献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笔者拟将印学文献研究的历史分为：宋以前为初创期、元代为发展期、明清为成熟期、民国和当代为鼎盛期。

最早进行印章方面文献归类汇集的是汉代的《汉官仪》。对印章在书画作品上的使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的是唐代窦泉的《述书赋》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这两部书对印章是用记录文字的方式进行著录。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对古代秦汉印章实物进行收集整理，如宋代杨克一《集古印格》、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对秦汉印章进行考证和真伪鉴别的，如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等等。这些都可视为开用汇纂的方式来整理印学文献的先河。特别是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以历史文献来考证印章真伪和历史价值的方法则是开印章文献校勘、辨伪的先河。这些具体的实践，为印学文献研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吾丘衍的《学古编》，可以说是标志着对印学文献进行综合汇集和整理的开始。如他在《三十五举》中汇纂了历代和印学相关的篆书文献，及自己在实践中得到的新认识，并运用一些辨伪考证方法对存在错误的文献进行纠正。而且在下卷中首次对篆刻艺术所需知识的相关书籍进行有目的的编目，强调读文献要注意版本，还附有一部以收集印章实物为典范的《印式》等等。《学古编》的编辑体例对后来的文献整理方法影响很大，为之树立了典范。

到了明代可以说是印学文献整理的第一次高峰期，出现了质的飞跃，当视为印学文献整理开始进入成熟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人们对古印真伪的考证热情剧增，印宗秦汉审美意识的普及和热潮的涌动，带来收集出版目的不同的古代印章的集古印谱热，集古印谱的形式在明代得到基本完善。个人艺术作品集的形式虽然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元代也有许多，但是大量出现和形式完善定型基本上是在明代中后期。在明代印论中，有很多印论著作都很偏重于文献的汇集，如徐官的《古今印史》、朱简的《印章要论》等等，朱简开始利用出土文物对印章文字进行校勘。在编辑专业用书方面，朱简编辑了第一本篆刻字典《印书》等。在辨伪方面，朱简等著作中批判了汇集古印中的错误行为，辨伪思想活跃，许多新的思维方式和其他学科知识都被很好地利用，变为文献整理的新方法，这些都可视为对印学文献

整理方法的拓展。

清代考据学的盛行使印学文献的收集范围和编辑校勘方法得到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大量的出土文献和先进的史学思想的介入，更加推动了印学文献整理科学化、系统化的迈进步伐，这一时期可视为印学文献整理的鼎盛期。如出现了对印人进行专门研究的《印人传》多种，标志着清代人在印学文献研究的门类上的创新。汇集印学理论的丛书也时有出现，如顾湘的《篆学琐著》等，表明人们对印学理论文献的高度关注。一些利用出土文献和秦汉印章选字编辑的篆刻字典，对篆刻创作提供了便利。大量的著名文人介入其中，使得各种文化知识融汇进来。叶铭等人对印谱进行系统编目，西泠印社成立后对流派印谱和个人印谱以及印学理论的集中系统地大规模整理出版，开社会团体整理文献的先河，标志着文献整理走向成熟。

民国时期，艺术和历史的观念更新，印刷术的升级换代，使得许多印学史的专著大量出现，其中很多内容都包括了对印学文献的整理。在一些大型丛书中也包括了对印学文献，如黄宾虹、邓实编的《美术丛书》，王敦化先生对印谱目录的整理等等。当代的印学文献整理可以说是再次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在以沙孟海、张鲁庵、柴子英、韩天衡、林乾良等为代表的一辈印学文献研究家，还有大批其他相关学科专家的介入，如文字学家、古代印章研究专家、文物书画鉴定专家等共同努力下，印学文献整理普遍受到印学研究者的重视，再加上对大型古籍丛书的编辑整理、印刷业的突飞猛进，促使文献在流通方面发展迅速，大大方便了人们对史料的挖掘。当代考古出土的文物众多，为印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史料；各学科研究融汇吸收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教育 and 研究方面逐步形成系统等等，因此，一大批的印学文献整理成果涌现出来，可以说不胜枚举，涵盖了印学文献的方方面面，例如《篆刻学》、《印学史》《印学年表》、《历代印学论文选》、《篆刻大辞典》等的编撰出版，标志着文献整理开始走向鼎盛。

但在印学文献整理的理论建设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和其他文献整理一样都具有“术先学后”的学科特

点。只有印学文献整理学科的日臻完善,才能为我们系统地论述其基本理论,实现印学文献研究规范化、学术化、科学化提供可能。历代文献整理成果中,相关理论较为零散,没有系统化,直到现在还没有印学文献整理的专著出版。理论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历代印学文献学家重实践、轻理论,和我们印学文献整理长期还停留在发掘、研究、整理阶段。但是,文献学理论来自于文献整理实践,来自于经验累积,来自于对前人否定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是所有的经验都能升华为理论,因此,对理论的总结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照搬其他学科文献的整理理论。^[8]

结束语

建立印学文献学其实就是对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系统化总结,在实践中把专业知识和其他门类的知识及时融入进来,并将事物的客观规律有机地结合,创造性地创新专业文献的整理方法。

建立印学文献学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必须源于实践,二是必须集众人之长。印学文献涵盖面广,且人各有专长,所以印学文献学的建立不是哪一个人能完成的,必须将前人的经验和现代研究者包括相关行业研究者的经验汇合在一起,进行提炼升华成为理论。

印学文献的整理方法,目前正处在归纳总结阶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文献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应该尽快地将前人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从中寻找到一定的印学文献整理规律,以便及时对今后的文献整理进行科学指导。总结出的规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归纳出的方法是否适合印学文献的特征?这必须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否则就不能成为知识。建立印学文献学的道路还很长,何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印学文献也将随着发展,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

针对目前印学文献整理队伍存在的问题,首先建议敞开大门,广纳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入,建议在高校组建相关专业进行人才培养。只有建立一支有学术修养、有广泛的文化基础、有印学专业知识、有篆刻创作

经验、有敢于创新意识的研究队伍,才是学科建设上等级的关键之所在。

以上是我平时整理文献一些想法,由于受到我个人认识能力限制,所以很不成熟,很多问题只是提出并没有切实解决,说明我在实践方面做的也不够。可以说每一个问题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话题,若将很多问题展开写,那将是一本专著。故在此仅供同仁讨论参考,并希望得到大家指正。

【注释】

[1] 《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2期。

[2] 见拙文《寻找真实的宋元》,见:《西泠印社首届孤山论印印学讨论会文集》。

[3] 见拙作《明代印谱、印论、印人活动的研究》,见:《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

[4]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校勘篇,齐鲁书社出版。

[5] 同 [3]。

[6] 见《印说》杂志中拙作《关于何震续学古编致翟屯建先生一封信》;与《明代印谱、印论、印人活动的研究》,见:《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

[7] 吴小如《古籍整理中的点、校、注、译等问题》,见于:《文献》,1985年第三期。

[8] 以上是我《印学文献研究的发展史》一文的大致构想,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细致研究。

作者简介 孙向群:江苏洪泽人,1964年生于南京。宋元篆刻史论家,古书画印鉴考证专家。

【本文责任编辑 郭超英】

试论“篆刻文献学”之构建

□徐 清

【内容提要】当代“篆刻学”学科发展急需建立“篆刻文献学”这一分支学科。它是以篆刻学与文献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以篆刻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文献的产生和发展、特点和性质、整理和利用的一门专科文献学。其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包括基础理论研究、文献实体研究、文献工作研究三方面。“篆刻文献学”的构建是“篆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端正篆刻学界学术风气、健全学术规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篆刻文献学 篆刻学 学科构建

“篆刻学”学科建设在整个人文艺术学科领域中起步非常晚,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只有短短十年时间,学科构架尚未成形,学科发展过程中许多基础性工作亟待展开。联系篆刻学发展的自身需求,并将其置于当代学术文化视野之下,尤其是以20世纪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作为参照,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构想:建立一门新的分支学科——“篆刻文献学”^[1],为“篆刻学”学科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和基础。

一、“篆刻文献学”之构建契机

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经历了20世纪的发展之后,已拥有新的学科深度和广度。它所具有的学术新特质既是诸多人文、自然学科相融合的结果,反过来又为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原动力。篆刻学作为一门晚起的新兴学科,同样不应脱离于这一学科网络和循环系统。文献学的发展轨迹和现有结构,对于“篆刻文献学”的建设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参照。

我国传统的文献工作,若从孔子整理《六经》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从学科角度对文献学及其系统理论加以归纳总结,则是始于近现代。“文献学”一词始见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0年,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专著即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正式出版。此后,魏建功、张舜徽、程千

帆等学者先后为“文献学”理论体系建设和学科构架作出贡献,使“文献学”逐渐成为一门囊括了目录学、版本学、训诂学、辨伪学、辑佚学、古籍整理体式学等诸多分支的专门学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献学获得新的发展和突破,在整个人文和自然学科网络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研究者借鉴和引入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信息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大大拓展了文献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文献计量学、文献信息学、文献传播学等新兴学科内容,逐步构筑起一个兼有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的新学科体系。有研究者指出,在当今知识与信息时代,文献学作为研究、整理、利用文献的一项专门之学,在揭示、整理、加工、检索、计量、利用文献等方面,应使用更现代化的手段,以适应种种新的需要。^[2]

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各门学科发展的需要,各类专科文献学纷纷涌现。例如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档案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教育文献学、中医文献学、法律文献学、经济文献学等,都各有专著出版。其中文学文献学下又有中古文学文献学、元代文学文献学、文学批评文献学等更趋细化的研究。艺术学科领域的文献学建设,当以音乐学为代表。自1985年天津音乐学院许勇三教授首次提出建立“音乐文献学”之后,^[3]音乐学界专家学者对于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给予了普遍关注,纷纷撰文著述、展开研究。近20年的音乐文献学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其涉及的课题领域主要包括:音乐文献学的学科含义、音乐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音乐文献的目录建设、音乐文献的现代化管理等。虽然在学科体系的具体构架乃至基本概念的阐释上,目前各家观点互有分歧,或者说还属于探索阶段,但对于音乐文献学具有的学科价值和重要意义已达成共识。研究者强调:中国音乐文献学应该结束以往的零散积累的状态,建立一门系统的、科学的、适应当代中国音乐学发展的基础学科,中国音乐文献学是一个具有重大意

义的学科分支，它将为中国音乐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的保证。^[4]

相比于音乐学等学科对于文献工作的重视以及研究已取得的进展，篆刻学在这方面显然已落后20年。但篆刻学的发展又何尝不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文献学？其实，不仅是篆刻学，整个艺术学科的文献学研究相较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总体上处于滞后。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使得篆刻文献学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认知起点和重要的参照，这又未尝不是幸事。

二、“篆刻文献学”之学科构架

“篆刻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至少应囊括以下三个块面：基础理论研究、文献实体研究、文献工作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以下内容：（1）对学科概念、性质的界定；（2）对学科研究内容、对象的分析；（3）对学科研究方法的探求；（4）对学科体系、框架的构筑；（5）对篆刻文献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研究等。“基础理论研究”是“篆刻文献学”作为专门学科得以确立的基础，其研究的精确与深入程度也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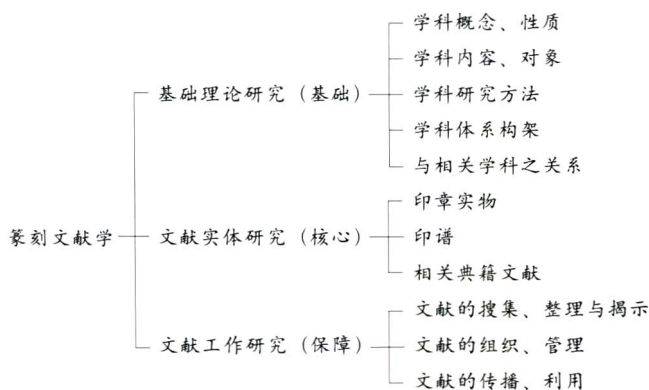
篆刻文献实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型，即印章实物（包括封泥）、印谱和典籍文献。“文献实体研究”即以这三类文献实体为主要对象，包括：（1）对印章的时代、形制特点、材质、名称的考辨及对印文的释读；（2）对印谱的著录格式、内容、流传过程及印谱史的研究；（3）对与篆刻相关的典籍文献的内容解读和文献版本、流传过程的考证等。从内容上来看，典籍文献中除了有对印章、印谱的论述外，还有印材、印具的介绍、篆刻技法的讲解、篆刻家生平与言行的载录、篆刻艺术理论的阐说、篆刻流派以及印学社团的呈现等诸多方面。

“文献实体研究”是“篆刻文献学”的最核心内容。

“文献工作研究”主要指对文献实体的整理、组

织管理和利用。它包括：（1）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揭示。“整理”这个环节包括校勘、辑佚、注释、汇编等，“揭示”则是指对文献的分类、著录、综述以及编制书目、文摘、索引、年鉴等。（2）对文献的组织与管理。比如书目与全文数据库建设（可供检索）、文献典藏、相关数据统计（如各类文献的使用频率统计，以利于文献价值的评估，利于对文献工作的自我检查和反思）等。（3）文献的传播与利用。比如相应软件的开发、使用（使篆刻文献借助于网络媒体、虚拟图书馆等新型渠道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再如研究者文献意识的培养和信息素养的提高。以上三方面的文献工作带有较明显的操作性，落实到每一具体步骤，更是繁杂甚至琐碎，但它作为必不可少的前序，为后续研究（如上述篆刻文献实体研究）的展开提供保障，甚至开启新的思路 and 方向。

“篆刻文献学”学科体系结构简图如下：



三、“篆刻文献学”之构建基础

20世纪以来，在印学家、篆刻家的努力下，篆刻文献的整理、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如果以一门学科的高度、以当代文献学发展的趋势来衡量，还存在诸多问题。下面我们以上文所拟的学科基本构架作为参照，就以往的篆刻文献整理研究情况作一简要回顾和反思，以

明晰当下构建“篆刻文献学”的已有基础和缺失之处。

（一）关于“篆刻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

“篆刻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而言基本是空白。笔者以为，所谓“篆刻文献学”，它是篆刻学与文献学两大学科融合、交叉而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以篆刻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篆刻文献的产生和发展、特点和性质、整理和利用的一门专科文献学。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普通文献学，同时应结合篆刻文献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和发展。当然，对“篆刻文献学”的如上界定是在参照其他专科文献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否恰当、准确还有待于检验，并且在具体概念的阐释上还需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比如何谓“篆刻文献”？“篆刻文献”究竟涵盖了哪些类型和内容？这些都是今后基础理论研究中应该继续的、不可或缺的方面。

篆刻文献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例如与文献信息学、文献类型学、文献传播学、文献社会学、文献计量学等，应该可以建立起多重联系，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纳其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从而把握文献现象的多元性、层次性、动态性，而非停留于静止、片面、单一的文献校对或注疏。以文献计量学为例，该学科的“引文”分析理论与方法，自20世纪初期产生以来，如今已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较充分的运用和不断改进，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概括而言，“引文”的规范使用，并不仅仅是为了表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或形式层面的学术论文格式的统一，它的重要性在于：研究者通过多途径的引文分析和统计，可以测知文献的聚类现象、文献的施引与被引现象、文献的作者群结构等，从而考察该学科的某些特征和背景，评估学科发展状况，预测学科发展趋势。目前篆刻学的研究论文中，引文和参考文献的标注多有不规范之处，究其原因，除了有关学术风气之外，对于引文的重要性和价值缺乏足够认识也是重要一端。引文的缺失，意味着丧失了一种学科自我评价、自我预测的资源 and 手段。

（二）关于篆刻文献实体研究

在篆刻文献学的三个构成块面中，篆刻文献实体研究是以往研究者倾力最多者，至今已取得不少成果。比如印谱的著录格式、内容、流传过程及印谱史等课题，先前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韩天衡先生撰《九百年印谱史考略》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文章论述了印谱的起始与发展、历来印谱的版本、印谱的品类、印章传世与印谱汇辑之关系，并通过对史料的考察，质疑“《宣和印谱》乃中国印谱之祖”这一成说，提出首创印谱之格的应是杨克一所辑《印格》。^[5]但是，继此之后能于印谱研究继续深入展开者却不多。

再如对典籍文献的研究，涉及到对文献的考辨真伪、区分良莠。有研究者考证发现，清代印学论著中存有抄袭前人著作的现象，如清陈克恕《篆刻针度》八卷几乎全部抄录自明人印学著作，尤以剽窃明代徐上达著《印法参同》为甚；陈鍊《秋水园印说》、《印言》两文，亦大多抄袭前人所论，尤以《印言》抄袭明人杨长倩《印母》为最；题明文彭撰《印史》恐是清季人伪托，内容与明甘旸所撰《印章集说》完全相同；题明何震《续学古编》卷中疏漏失误处甚多，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其他印论汇纂如徐坚《印笈说》、李宜开《师古堂印说》、戴启伟《啸月楼印赏》等，也是真伪并存。^[6]已有的这些考辨对于清理篆刻文献、探知古代篆刻理论史的真正发展轨迹而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是篆刻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但是，在当代篆刻著述中，这样的考辨以及对文献具体而微的释读都颇为欠缺，甚至有不少的研究者在论说明清篆刻时，对已有的考辨成果或置之不理，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观点的阐发不免随心所欲。

（三）关于篆刻文献工作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篆刻文献工作研究较为薄弱。首先是篆刻文献尤其是典籍文献的搜集情况。历代的篆刻文献材料除了少数是以专著、专文形式出现之外，大